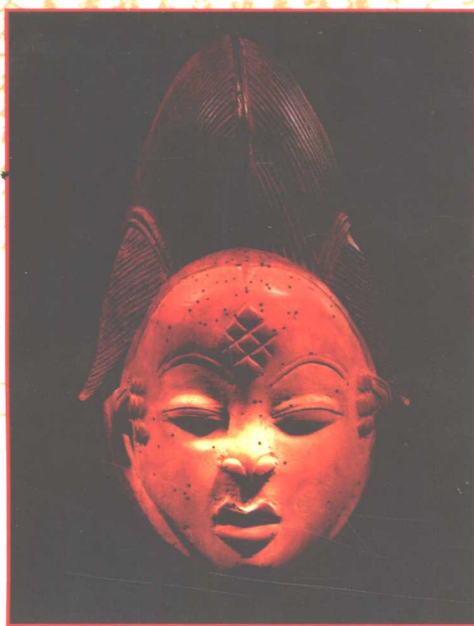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新會 家言 姓有 馬林 海晏 奔欣 齊銘 黃廷 敢振 之至 某宅 將主 謂曰 勿以 人言 置散

擲 散 得 妻

徐友漁



四川人民出版社

精神生成语言



徐友渔



00913680

精神生成语言

SPIRIT BECOMING LANGUAGE

SPIRIT BECOMING LANGUAGE

精神生成语言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书号

C53
X22

4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温 洁

封面设计：钟 鸣 唐璟萍

技术设计：王 力 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精神生成语言

徐友渔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2 千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815—1/B·147 印数：1—3100

定价：22 元

前 言

本丛书为四川籍中青年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选集。

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孕育了众多的风神俊逸之才。但由于“贵远贱近”之风使然，今人易首肯古代诗人哲人，而对现代学者则多持一种更审慎的态度。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文化上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使现代学者相对于古代学者而言，似乎有了更大的承负。这砥砺了当代学者的学术品格。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思想和学术的广度上有新的开拓，为本世纪中叶一度中断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当代学术中的“川籍学者”的提法，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事实上，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一切界限的绝对划分都有其局限性。如果从地缘文化的角度去看当代学者的思想形成、文化素养和言述方式，或许会生发出一种新的意味和新的结论。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视，其意义当亦在此。

我们欣然推出这些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并在全中国引起反响的川籍学者的著作，并有意识地从出版者的角度、以地域文化的目光展现当代学术，以期为研究当代中国学术提供一个文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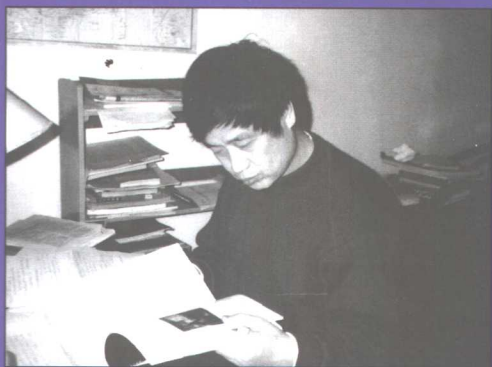
缘学的背景框架。

这套学术文丛具有开放结构。首批推出的是学术界近些年读者较为熟悉的学者的论著。今后将进一步扩大，使出版学者“有分量著作”真正成为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

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对丛书提出批评建议。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徐发渔，一九四七年生于成都。一九六六年为成都一中高中三年级学生，一九七七年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一九七九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一九八二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为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访问学者，自一九九五年起为研究员。

《精神生成语言》

徐友渔

《通向本文之路》

王一川

《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

王岳川

《道与逻各斯》

张隆溪

《人文学者的生存方式》

冯 川

《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

刘小枫

《未完成的叙说》

黄 平

《文化权利与知识分子》

陈维纲

目 录

- 1 选择与道路
——谈谈我的思想和学术经历

第一部分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研究

- 11 20 世纪十大哲学问题
29 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80 当代英美与德法语言哲学比较研究
137 维特根斯坦论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
160 两类真理说的命运
——从 17 世纪到当代
179 关于后现代哲学的几个问题

第二部分 当代文化评论

- 195 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
210 从“主义”到“问题”
——中国学术思想近 10 年走势纵观
221 民间社会和文化问题
231 世纪之末的忧虑
237 “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漫议
244 我们是否还需要科学精神
247 关于后现代思潮的一种哲学评论
253 社会批判和道义立场
257 “学以致用”——老话题和新语境

- 261 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
268 人与事：一段精神历程

第三部分 书 评

- 281 批判·理性·精神世界
——读波普尔的自传《无穷的探索》
291 文化民族主义的镜鉴
——读《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296 评《剑桥中国史》第15卷关于“文革”的描述
和观点
——兼评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
319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
340 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
——读《顾准文集》
347 中国学人的洞穴假相
——读《天演论》
357 辜鸿铭的保守主义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随感
360 新儒家与康德
——评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和超越

附 录

- 382 跋
383 学术简表

序：选择与道路

——谈谈我的思想和学术经历

每

当打开一部学术著作或阅读一篇论文，我自然会以专业眼光掂量它的内含——观点的新颖性和启发性，材料的可靠性和来源，论证的技巧和逻辑性，等等。我相信，随着历练和修养，我的眼光会越来越老辣。但是，一种童心般的冲动始终没有泯灭。我想知道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想到要研究这个问题？甚至，他为什么不去干别的，偏偏要当学者？也就是说，我不但想了解他的观点，还想了解他的动机；不但想知道结果，还想知道过程。有时甚至想知道，写这本书的人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得怎么样，比如，他在钱财方面是大方还是小气，对朋友是冷淡还是讲义气？

我假定，现在翻着这本书的读者也有类似的兴趣。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我的思想，我先谈谈产生这些想法的原因和背景；为了便于大家评判我的学术工作，我先交待一下我的学术经历。

我的专业是哲学。实际上，我很怀疑能不能把研究哲学当成

一种职业。可以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掌握一种技术或语言文字，但哲学不是只靠学能掌握的。我记得，念小学时常常是身子在教室里，思想却飘荡在茫茫宇宙中。我想知道，是否还有别的生物，他们看我们，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如果有，那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们的一切努力奋斗、喜怒哀乐还有什么意义？我幼年时外婆和父母相继去世，每一次面对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我都感到心灵的震撼。永远地、彻底地失去对世界的感觉，失去与亲人的感情联系，这是一件无法思议的事。如果人最终不免一死，那应该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种种利害得失，还是应当竭尽全力使每一时、每一事都有意义？

文革使我有机会和时间接触哲学经典文本。那时，“思想文化专政”全方位地展开，但另一方面，一度上当受骗、迷信狂热的青年学生却在苦读苦思，我们首先要在思想上自救，然后看看有没有途径救国。和当时的众多自学者一样，我看外语、自然科学、文学、历史、政治等各种书籍，但最有刺激性的是20世纪哲学大师的著作。如果说，读柏拉图、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令人心醉神迷，那么读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使我感到失重和天旋地转。在这最抽象的领域，我感到了中国和世界的隔膜与距离。我考研究生决定专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逻辑经验主义。在步入学术界之前，我已经有一种很深的感觉：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长于政治伦理和审美体验，拙于对经验的归纳分析，缺乏逻辑、理性、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文化人往往从文学艺术、人生遭遇中获得灵感，其表达宁要可爱，而不要可信。我认为，这种阴柔的传统需要阳刚之气补充，在充满精气和血肉的文化躯体里，亟需钙质以强身健骨。如果继续在灵性和体悟方面下功夫，其结果最多也是锦上添花，搞过头了还会在现实层面表现为浪漫主义和独断的政治，以及诗人气质的乌托邦狂热。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现代化，是建立民主法制社会，对于这个目标，表面上平实无

华的经验、常识和理性其实是雪中送炭。

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刚上研究生时写的“马克思的异化观”，它鲜明地反映了刚进入 80 年代时的思想学术气氛。那时正倡导思想解放，人们刚挣脱文革“极左”的思想桎梏，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什么是马克思的本意。但我有时将此文称为游戏之作，因为写作的原始动机是替一个朋友打抱不平——结果争论双方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最终也握手言和。我把一篇评罗素认识论的文章视为我的专业起点，它是提交给现代外国哲学第二次全国讨论会的论文，这次会议于 1981 年底在西安举行。

在 20 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中，罗素是我首先瞩目的思想巨人。他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并对数学和逻辑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他以经验为基本素材，以现代逻辑为强有力的粘合剂，他构建的知识论大厦是空前坚实的。同时，他具有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虽出身于英国最显赫的贵族家庭，但为从事反战和平运动而两度入狱。在西方，人们称他为本世纪伟大的道德家。但我没有在罗素思想中多作停留，1982 年初夏，当我正等待为题为“罗素的逻辑原子论”的硕士论文答辩时，我已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因为我模模糊糊地感到，现代哲学中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需要我去了解和研究，把握它是全面、深入理解 20 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的关键。

当我钻出了令人头痛的文献，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时，我把 20 世纪西方哲学最普遍的特征，20 世纪哲学对近现代认识论哲学的最根本转折称为“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这当然是西方哲学家提出的术语。记得 1983 年春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宿舍，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中青年学者畅论和漫议当代思潮的大趋势，最后也归结到“语言转向”问题。80 年代文化热中，我的朋友和我曾策划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后结构主义和英美分析哲学各个角度对“语言转向”作一次全面的介绍和阐述，以有助于

国内学界把握这个趋向。这个设想因故没有实现，但我始终抓住这个题目不放手。当我于1986年至1988年在牛津大学，以及1992年至1993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作访问研究时，我获得了极好的深入研究这个课题的条件，其结果是一部专著的出版，它的原名就是《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出版时，编者提议将其改为副标题，正名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然，语言转向的确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在哲学和在别的领域，还有许多人把与自己有关的巨大变革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一位研究康德的老专家问，我的“哥白尼革命”是指康德的那次还是别有所指时，我免不了有几分尴尬。我为这本书下了很大的功夫，力图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和当代西方同行展开对话，它于1995年获得“金岳霖学术奖”。当然，它只是在英美语言哲学传统中讨论问题。在这之后，我和同事获得国家“八五”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研究基金资助，完成了一个视野更广的课题，其成果是1996年出版的《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

一般人习惯地认为，哲学家、思想家应为通才，而英美哲学太专门，技术性太强，所以我的路子不时受到一些好心人的质疑。我的回答是成竹在胸的，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思想上的器，就是分析方法、论证方法，这是英美传统之所长。我以为，不论在科学上还是在哲学上，提出一些有吸引力的主张都不一定太难，难的是能否论证它，证明它能够成立，区别于常人和科学家、哲学家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我当然不会一辈子对英美哲学顶礼膜拜、亦步亦趋，我把治英美分析哲学当成一种思维训练，以学会和养成缜密思维，精确表述的习惯，以清除那种海阔天空，以气势和文采而不以把握问题实质取胜的风气。如果我有特别之处的话，就是愿意为掌握一种工具或方法付出很多精力。当然，我现在已着手将研究扩大到欧洲大陆哲学，扩大到哲学史，不知有无可能扩大到东方哲学——它的深邃和神

秘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最近写了一篇论康德和新儒家的论文，表明我的志趣不在技术化和专门化方面。

我从 1995 年起开始作思想文化评论，介入当前中国思潮之争，内容涉及后现代主义、人文精神失落问题、80 年代与 90 年代思想、学术范式的转换，对启蒙、理性的评价，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等等。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楚，进入 90 年代之后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心浮动、弃学经商是表层现象。如果说 80 年代的主调是启蒙和现代化的进行曲，那么 90 年代则是多种调式和旋律，时时有嘈杂声和刺耳的不和谐音。在转型期，中国知识界在深刻的社会变化中产生巨大的困惑，当现代化实际进程不期而至时，它远不像乌托邦理想那么光明和惬意。现实使人反思，反思使人深刻地再度确认既定目标，也使人怀疑与否定。鸦片战争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了体与用，民族文化本位论与改造国民性等争论。由于历史事变纷至沓来，思想学术之争要么无疾而终，要么演变成政见之争，但问题并未解决。每当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人们似乎又退到原点，新一轮争论实质上是历史的循环。最新的这场争论充满了当代西方思潮的时髦话语，如果说，有人敢于对他们称之为的“启蒙话语”、“现代化迷信”、“理性崇拜”、“科学霸权主义”说“不”，那么我凭着自己对当代世界思潮的健全理解和全面把握，凭着对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痛苦经验和曲折道路的铭记，要对某些时髦的西方思潮及其在中国的生硬移植说“不”。

几乎与进行思想文化评论的同时，我开始发表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论著。从当代西方哲学到“文革”研究，这个跨度大得很难向人解释。其实，哪里需要思想，精神就会寻踪而至。我于 1992 至 1993 年第二次在英国做访问研究，偶然看到一篇研究“文革”的论文，作者一开头就引证海外的说法：敦煌在中

国，敦煌学在国外；“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国外。作为对“文革”有刻骨铭心记忆的人，我被这一说法激怒了。但是，当我翻阅了很多中英文文献之后，不得不承认上述令人不快的说法是真实的。冲动之下，我立下志向：一定要为建立中国的“文革”学作贡献。学术研究的基本功是相通的，我很快发现，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之所以落后，之所以称不上什么“学”，除了客观条件限制外，关键是中国的研究者没有照学术规范工作，他们各自为政，重起炉灶，不但不与外界交流，而且根本不知道已有的研究成果。自顾自地、自发地、小生产式的工作，使中国人在90年代还在重复西方研究者70年代的工作，而成果还不如人家七八十年代的。一般人以为谈“文革”，肯定是一掬热泪，一肚子酸甜苦辣，而这自然是中国人的专利。我的进路与此大异其趣。我一入手就是介绍和评析海外研究的已有成果，以期使中国学人有一个参照系和坚实的起点。我写每一篇学术论文，第一部分都是缕述西方研究者先前工作的优劣得失，再以更公允的论点，更扎实的材料阐明自己的立场。应该说，这种研究方法是卓有成效的，我的一系列论著引起了海内外的注意。我坚信，只要条件允许，“文革”学研究的大本营一定会安扎在中国大地。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我的学术动力主要是时代的需要。确实，虽然我最大的爱好是埋头读书和冥想，但时代脉搏的跳动，祖国大地上每日每时发生的一切，总是深深地刺激着我，强烈地感召着我。我始终把自己的学术道路与中国的现代化命运相联系，我常常感到自己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选择，因为人生苦短，能力有限，人生的完美，即在于意义的最大化追求。有时，我会感到一种矛盾和苦恼，这是“独创”和“教化”的矛盾。可能大家会一致认为，一个研究者的最高境界，是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见人之所未见，道人之所未道，独创性是天才的表现和证明。在研究和写作中，每当我自认为获得了一种真知灼见，

就有一种巨大的、内在的狂喜，为了这种高峰体验，叫我舍弃许多别的幸福也在所不惜。这种喜悦具有阳春白雪的性质，但我同时能意识到一种下里巴人式的责任。因为学问是做不完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一个人才情兴致的最大发挥和整个民族精神文化素质的提升，孰轻孰重，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一个处于国内最佳研究条件的人，其精力应主要用于追寻那千虑之一得，那耀眼的一刹那，还是应该全面、系统地介绍新学新知，为最后大规模的团队登顶拓荒铺路？我想，一般人很难理解这种苦恼，会认为答案并不复杂：率性自然，二者兼得。我把话说得简单直露一点就是，以中国足球队为比方，如果它落后得你再努力也离世界冠军相距甚远，你是力争在国家队当尖子呢，还是去给青少年当教练，着眼于下一代？我的矛盾和苦恼至今并未消失，我实际上是力求二者兼得，也许最后是两头落空，都不成器。

前不久，京都的一位老编辑对我说：现在是你们这批人写出传世之作，端出自己的理论和体系的时候了。我将届 50，即达知天命之年，我从不妄自菲薄，但我坦率承认，我不打算端出自己的理论和体系，因为我没有自己的理论和体系。对此我并不自惭形秽，我自知所知甚少，唯一知道得稍多的一点，是明白那些大师们真正的功力之所在。即使我毕生也没有自己的学说或传世之作，那也没有什么。这是求不来的，只要耕耘得尽心尽力，长出什么，就是什么。中国历代有不少才子型学问家，当代似乎也不乏其人，他们才思敏捷，潇洒轻灵，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每一重要阶段，每个转折关头，都能指点方向、领导潮流。我偶尔拜读此类人物大作，先是被高屋建瓴的气势和纵横捭阖的论说慑服，但渐渐发现其空疏，关键处的跳跃，要害处的回避。当老实的追随者还在津津乐道于他们的宏论时，开创者们早已改换了旗号，驰骋于另一个战场。他们也许不是成心误人子弟，但自省能力和责任心肯定是不够的。我很清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批人的学

术道路过分顺畅。极“左”路线和“文革”浩劫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代价，学术文化百花园横遭践踏，几近荒芜。我们赶上了国家复苏、百废待举的大好时机。当我们还应当是文化生产的见习生时，供需之间严重脱节使人匆促地站到第一线，在不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头脑灵活外语熟练的人几乎一搞一个准。在沃野千里的平原上，有的人信马由缰，有的人则不时驻足停留，重新勘定方向和位置。我确信，聪明者应有自知之明。民族的重创使每个人都不能幸免，几乎无人能逃避根基不牢的毛病，少年得志难免昙花一现，厚积薄发才不至于江郎才尽。

我有一种经验：写作和出版是作者给自己制造压力。我希望，本书献上的成果和努力，会获得朋友们的批评指正，这是我提高自己学术水准的动力。